

“畸恋故事”里的叙事建构、神话原型与启示——影片《朗读者》赏析

【摘要】 影片《朗读者》通过男女主人公的“秘密”建构了整个叙事。麦克与汉娜的不伦之恋中蕴含着“漂泊与回归”这个传统的文学神话原型。同时,影片亦提供了一个反思二战的独特视角,关注德国普通个体在战争中的无奈与悲哀。汉娜的悲剧也在提醒观众,西方“法律神话”的正义与公正的宏大叙事中往往忽略个体的存在。

【关键词】 《朗读者》 神话原型 法律神话

《朗读者》(The Reader)由著名导演斯蒂芬·戴德利(Stephen Daldry)根据本哈德·施林克(Bernhard Schlink)同名小说改编拍摄。电影获得空前成功,一举摘得2009年第66届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并获奥斯卡5项核心大奖提名,其中凯特·温斯莱特(Kate Winslet)凭借其饰演的女主角汉娜·施密特(Hanna Schmitz)获得第81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项。男主角麦克·伯格(Michael Berg)分别由德国少年大卫·克罗斯(David Kross)和以《辛德勒的名单》《红龙》等电影为人熟知的拉尔夫·费因斯(Ralph Fiennes)饰演。

故事时间跨度长达三十七年,从1958年到1995年。影片着力表现4个时间段中的故事细节:1958年的偶遇与相恋,麦克成为“朗读者”;1966年的审判,汉娜被判终身监禁;1976年麦克离婚后重新成为“朗读者”;1988年汉娜准备出狱,两人见面,后汉娜自杀,麦克完成汉娜遗愿。

故事开始于1958年的西德,麦克从学校回家途中突发呕吐并得到汉娜的照顾。康复后,麦克前往表示感谢,却很快地与汉娜相恋,“朗读”成了他们性爱中一个重要内容。在“朗读”中,麦克获得了一种被需要的感觉,而汉娜则在聆听中感受文学作品中的喜怒哀乐,并十分有效地在聆听中获取知识获取养分,但有一天,汉娜却忽然离开住处并从此杳无音讯。1966年,时为法学院学生的麦克在一个起诉“二战战犯”的法庭上重见汉娜,汉娜为不愿别人知道其是文盲,认下火灾重责,被法庭判处无期徒刑。1976年,面临婚姻危机的麦克,重新开始其“朗读”生活,把朗读录音源源不绝寄给监狱中的汉娜,汉娜通过自身努力,借助录音与书籍的比照,得以学会认字、写字。当麦克再次见到汉娜时,已是1988年,汉娜服完20多年的刑狱,准备出狱。麦克答应在汉娜出狱那天接她,但当他拿着鲜花赶到监狱时,见到的却是汉娜冷冰冰的尸体,用两堆厚厚的书作垫,汉娜出人意料地选择了自杀。

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典型的“畸恋”故事,

一个15岁少年与一个36岁女人的爱情故事。然而,细细观赏,观众可以发现,这是一部让人深思的故事,是一部尝试从普通个体视角来反思二战的故事。

一、影片的叙事建构:麦克与汉娜的“秘密”

影片在一种回溯性、现实与历史交相夹杂的叙事中进行,音乐、画面、人物特写、故事节奏都呈现一种明显的沉闷与神秘气氛。这种沉闷与神秘推动着剧情的发展,刺激着观众的好奇,并在好奇中开始自我追问,“这个畸恋故事是如何产生的?”不期然让人想起《洛丽塔》的故事。根据麦茨的定义,“叙事是一个完成的话语,来自于将一个时间性的事件段落非现实化。”[1]《朗读者》的叙事建构是通过男女主人公的“秘密”来完成的:1、麦克的“秘密”①少年时代与36岁汉娜的相恋成为其终身萦怀的秘密;②在明知汉娜并不识字而认下重责时,没有提供应有的帮助,成为其终身的负担;2、汉娜的秘密:①不能认字,为保护这个“秘密”甚至宁愿失去自由,承受终身监禁的惩罚;②曾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担任过警卫工作,为保护这个“秘密”,离群索居,但仍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电影一开始就创造了一种沉闷而神秘的气氛:1995年,麦克的寓所,背景几乎没有什么声音,但不是静谧,而是一种不协调的沉闷,表情严肃的麦克与一不知身份女性的简短对话,愈发让人对男主角产生好奇,只知道他要见女儿。他看着窗外,看着窗外渐渐驶过的火车,逐渐推出了30多年前的情景,通过他的视线,观众回到1958年的西德,开始与他一起重温那个非同寻常的感情历程。

麦克的两个秘密成为其终身的负担。拉尔夫·费因斯饰演的成年麦克在整部电影没有露出一丝笑容,有的只是沉重与苦涩。他的秘密只在片尾与火灾幸存者的女儿见面时不得不透露出来。影片最后回到1995年麦克与女儿的见面。女儿说:“我犯了错误。”麦克说:“你能错到哪儿呢?”我们不知道他女儿的错误,也不知道她将来如何去面对她的错误,这些都不重

要,重要的是,父亲带着女儿到了汉娜的墓前,最终把他的秘密、他的错误告诉了女儿。至此,影片既完成了时间的衔接,又让男主角释放了这个秘密,释放了沉重。

汉娜为其在奥斯威辛的罪行与无知遭受了惩罚,但终身监禁显然超过其所应承担的责任。让观众萦怀是汉娜的另一个秘密。其实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秘密,但她一生小心保护。她不识字,但其单纯的心灵充满对文化的渴望。观众将无法忘怀她为麦克所朗读的文学故事的嬉笑怒骂,在郊区教堂聆听圣歌时的盈盈泪光,对周围学生随意浏览菜单时的羡慕眼神。秘密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秘密让观众思考:为什么她要如此保护这个秘密,甚至为了保护这个秘密不惜成为“纳粹婊子”,接受终身监禁的惩罚。

整部电影围绕着主人公的“秘密”而建构起整个叙事。最终,“秘密”都得到了释放:麦克把秘密告诉了“奥斯威辛”火灾中幸存者的女儿与他自己的女儿;而汉娜则通过在狱中通过麦克的录音带自学文化,也最终释放了“秘密”。

二、麦克与汉娜的共同渴求:“回归”

“漂泊”是奥德赛的宿命,他花了十年时光历经千险终于实现“回归”之梦。自此,“漂泊与回归”成为许多文学作品的共同主题,许多文学作品不断以各种形式重复着这个母题,影视也不例外。

当我们聚焦于麦克与汉娜的年龄差异时,他们的不伦之恋显然是一种不符合社会惯常认可的“畸恋”,影片只不过是一则“畸恋轶事”而已。然而,如果我们换一种视觉,或如弗莱所言的“向后站”,忽略他们的年龄差距,或把他们换成一对普通的恋人,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的感情其实隐藏着一种共同的心灵渴求,一种相互的心灵需要,可以“清楚地看到它的原型”[2]:漂泊与回归。

对于麦克而言,汉娜是他的“家”,是其漂泊与孤独的心灵归宿之处。1958年的偶遇,麦克在汉娜那里获得的不仅是一种性意识的开拓与成熟,更重要的是一种“家”的感觉,一种回归的感觉。麦克很少交际,有着强烈的自卑。他希望得到别人的重视和鼓励,而此时的汉娜正是他的“心灵之家”。每次上完学,生性孤独的麦克远离同学,早早的到汉娜那儿,因为只有在那里,他才可以得到性、心灵、情感的放松,同时在朗读中获得一种真正的尊重与认可。而在他自己家中的沉闷氛围下,他所感受的只是一种压抑与受管束,一种与学校类似的控制压力。

1976年,在离婚前夕,麦克带着女儿回到母亲家。母亲直接告诉他,“我担心的是你!”因为,母亲看出,这个家未能成为他的港湾,他仍

在“漂泊”。在一个下雨的夜晚,他非常自然、甚至是有些如释重负地拾起年轻时读过的书籍,开始为狱中的汉娜朗读一本又一本的荷马、席勒、歌德、狄更斯、托尔斯泰和契诃夫。当他决定给汉娜继续担当“朗读者”时,麦克的神情中分明地表现出一种犹豫与彷徨之后的坚决与释然:在“朗读”中,麦克实现了与汉娜的“相聚”,实现了“回归”。自此,他一直这么做,把录音带源源不断地寄给监狱中的汉娜。在这种“朗读”中,男主人公获得了一种满足、一种归宿感。1995年,也是在汉娜的墓前,麦克向她女儿坦诚了一切,希冀实现心灵的平静。

36岁的汉娜是孤独的,是一个自闭症者,没有家庭,没有亲人朋友,是一个电车售票员,终年生活在“漂泊”中。麦克的出现,使她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她的房子不再只是一个睡觉的地方,而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她的精神归宿。在这里,她不仅有了爱情,更拥有麦克“朗读”所带来的丰富的精神享受,不识字的自卑也让她对朗读产生了极高的兴趣。这个少年“朗读者”成为了其心灵“漂泊”的停泊之地。她喜欢听麦克的朗读,那朗读中的世界,更让其茫然而单纯的心灵有着一一种依归。在监狱中待了10年(1966-1976)后,突然收到麦克的录音带,汉娜没有期盼的监狱生活发生了变化,又开始有了丰富的精神享受。最后,她终于下决心借助录音带学识字。对她而言,“朗读”成了她“漂泊”多年的最终依归,乃至最后她用书籍垫脚而自杀。这个镜头似乎在暗示,书籍是她到另一世界的垫脚石。

在文学中,“漂泊”似乎总是与“水”联系在一起。如果说,男女主人公的生活经历、心灵状态证明了他们之间的相互需要,相互成了对方的“回归”之所,而影片反复出现的意象“水”则更加强了这个主题:偶遇在一个下雨天;浴缸与性爱在影片中的交相出现;在多组镜头特写中,麦克总是从游泳池直奔汉娜家。更别忘了,《奥德赛》是麦克给汉娜读的第一本书。

纵观故事的发展,在“漂泊”与“回归”中,麦克与汉娜之间的关系也在不断发生变化。1958年偶遇后,他们是恋人关系,是朗读者与听众的关系;在1966年的“二战战犯法庭”上,他们成了审判者与被判刑者的关系。而在1976年,麦克是一个婚姻失败者,汉娜则是一个已服刑十年的囚犯。他们通过“朗读”,重新“相聚”,一起经历着“救赎/被救赎”。1988年汉娜服完刑后,通过其自身的努力已经可以自己“朗读”了。至此,他们通过“朗读”而建立的关系不再存在,各自走向自己的归宿。

三、汉娜:“法律神话”下的个体悲剧命运

影片不仅借助这个“畸恋”故事触及到了爱、罪恶、人性、宽恕、救赎等问题,在以独特视角反思二战的同时,促使我们直面汉娜的命运:一种“法律神话”下的个体悲剧命运。

面对战争的罪恶,我们常常以“正义”、“道德”、“法律”、“人性”等宏大概念对战争行

为进行观照,对那些在战争中犯下罪行的个体进行审判,但很少考虑那些个体的特殊性。正如巴尔特所言,“神话实际上具有两种功能:它表意和告知,它使人理解并强迫人理解。”[3]《朗读者》关注的是正是战争中的普通人。影片提醒我们,在审判战争罪犯时,有许多汉娜那样的不自觉的参与到战争罪恶的普通人,他们自己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也是受害者。

面对法官的问题,汉娜在法庭上同样诚恳地反问道:“新的囚犯在不断被送来,集中营里没有地方,如果不把一些人送走,如果你,你会怎么办?”汉娜在法庭上对审判长的反问其实提醒,在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中,小人物实有其无奈和痛苦。侵略战争与“奥斯威辛”是当时纳粹德国的一种国家行为,汉娜那样的普通人被卷入其中,进行着国家让他们做的工作。然而,代表法律与正义的法庭面对的永远是具体的个体,所有的“罪与罚”都必须由个体来承担,而并不在意于个体在行为中的重要程度。影片并没有过多聚焦于这个问题,只是通过汉娜的那句反问提醒我们在反思战争中要关注另一种受害者。

然而,影片实际上对那代表公正的“法律”提出了质疑。在整个审判过程中,各种身份的人之间充满推托与谎言。审判显然缺乏对人性的深思,对正义的虔敬。汉娜为了掩饰自己文盲真相,承认了那个致命的报告,而法庭并未深究下去,找出真正的责任人,而判处汉娜终身监禁,皆大欢喜地结束了审判。就此而言,法庭是不严谨、不负责任的。

时为法学院实习生的麦克,明知汉娜的无辜,明知汉娜为了隐瞒自己的文盲秘密而认下本不属于自己的重责。麦克此时完全有能力帮助汉娜澄清事实,然而他选择遵守“出于主动意愿的自我决定”和“伸张正义”的法律原则,取消了与汉娜的会面,更没有向她提供任何法律帮助。为了不暴露自己与汉娜的关系,他选择了沉默。在去探监的路上逃跑了,连给汉娜鼓励的勇气也没有,致使汉娜最终被判终身监禁。此后,身为律师的麦克,一直没有去纠正这个明显的错案。即使在10年之后,他也只是选择做一个“朗读者”,选择以“朗读”进行自我救赎,而不是通过纠正错案来维护公正,挽救汉娜,而是任其在监狱,甚至不敢回信。

汉娜的种种言行,体现了一个文盲女性的率真、本色。即便被审判,她依旧保持着这种本色。作为纳粹集中营的看护,她罪孽深重。但并不能排除她无知作孽的可能。尤其是她令人匪夷所思地掩盖自己是“文盲”的事实,甚至不惜被终身监禁。唯因如此,她可恨、可爱而又可怜,令读者陷入两难之境。而且,她的存在亦让读者不得不重新思考人性、生存、道德、情感、历史、政治、法律等重大人生命题。

汉娜的悲剧就在于,她所接受的训练使她没有能解救教堂里的那些犹太人,这是残

酷的、有罪的,但这符合她当时的思考和行动能力,符合那个时代德国强加给一个文盲的一切。然而,在她听了那些“朗读”之后,在自己能阅读之后,开始了自己的真正思考。服刑二十年的汉娜终于被减免刑期,即将获得自由,监狱长恳请麦克为她安排出狱以后的生活,因为他是二十年来唯一和汉娜保持联系的人。于是,在正式出狱以前,头发灰白的汉娜和略显疲惫、勉强的麦克在监狱的食堂里见了面。他们之间有一个发人深省的对话:

麦克:我总是在想以前的事情。你会常常想起过去吗?

汉娜:从法庭判决那天开始,我就不再想以前的任何事情了。

麦克:你现在怎么看?

汉娜:我怎么看都无关紧要,死了的人不会再活过来。

麦克:那你学到了什么?

汉娜:我学会了阅读。

如果说,在“奥斯威辛”当看守是其作为纳粹德国的公民而行使自己的“职责”,并犯下严重罪行,那么后来的悲剧命运则是“法律神话”所造成的。

这是个饱含爱、罪恶、秘密与救赎的故事。电影打动观众的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了问题,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我们一直以之为当然的宏大叙事:正义、法律、道德、人性、宽恕。影片提醒我们,宏大叙事构筑的现代“神话”淹没了普通个体的存在价值及苦难,法庭的公正判决可能忽略个体的无奈与“秘密”,而承受集体意志所犯“战争罪恶”之后的“罪与罚”的也正是各种个体。面对汉娜的“秘密”与“罪行”,我们难道不应该再次审视在各种宏大叙事下的个体吗?当我们关注那些普通个体在历史大事件中的悲哀命运时,我们是否该认真反思那些借着国家或集体意志进行的各种战争呢?

注释

- [1] [加]安德烈·戈德罗 [法]弗朗索瓦·若斯特:《什么是电影叙事学》,刘云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2页。
- [2] [加]诺思洛普·弗莱《批评的剖析》,陈慧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56页。
- [3] [法]罗兰·巴特《罗兰·巴特随笔选》,怀宇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二版,第99页。

参考文献

- [1] 张国龙:《“朗读者”的“成长”书写及其他》,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
- [2] 肖复兴:《和历史调过情以后——读《朗读者》》,《全国新书面·新书导读》2009年第4期。
- [3] 何翔:《“朗读者”:离心灵和历史最近的人》,《书城》,2009年第5期。

作者简介

钟晓文,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文艺学博士生。